

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的双建构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项佐涛 李家懿

内容提要:目前,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分析大多基于认同政治的视角。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案例表明,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共同建构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民粹主义政党淡化意识形态的左右之分,不断地强化身份“认同”,区别“自我”和“他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民族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政党。从利益政治的角度看,民粹主义政党尽管不再以阶级动员为主要手段,甚至尽力回避“阶级”“阶层”等词语,但“人民”与“精英”的区分使其成功吸引了社会转型中的受害者。选举结果表明,中下收入者是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支持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和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趋势为它们提供了丰沃的社会土壤。正是通过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的双建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强化了底层民众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把草根性的政治参与转换成自己的认同基础。

关键词:认同政治 利益政治 民粹主义 中东欧 政党

引言

民粹主义政党^①是政治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在对民粹主义浪潮肇始的原因分析中,认同政治是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着眼点。当前,基于认同政治的分析主要被应用于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近年来,中东欧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从认同政治的角度探讨其崛起原因的著述并不多。^②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涵盖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以及民粹主义在中

^① 民粹主义政党很难在意识形态上以“左右”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内核,而是本着“取悦于民”的原则,宣称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在党名中常常冠之以“人民”“公正”和“公民”的名号。

^② 本文所言的“崛起”是指主要政党曾经执政、参政或者正在执政、参政,或者在议会中拥有较有影响力的议席数量。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众多,彼此差异也很大,但是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简称“青民盟”)、捷克的“不满意公民行动2011”(ANO 2011)三个正在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对象聚焦于上述三党。

东欧地区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国别范畴下的具体表现。有学者结合中东欧国家转型经历的特殊性对其民粹主义政党崛起进行了整体性原因分析;^①还有学者基于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政治极化等理论做了具体的国别研究。^②当然,许多学者也研究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个案,^③但是相关研究局限于描述研究对象的纲领主张和活动的“非自由的民主”“离经叛道”等方面,或者从社会转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关系、新媒体的影响等角度分析其兴起原因,而不是基于认同政治或者传统政治学的利益政治的角度。最近一两年,有些学者开始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研究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但相关成果以介绍性为主。例如,波兰乌普萨拉大学的林奎斯特(Tua Lindquist)比较了匈牙利青民盟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塑造认同政治方面的措施和效果;^④奥切普卡(Beata Ociepka)分析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塑造国家身份认同的尝试及其与欧盟的关系等。^⑤

国内学者对于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关注始于2010年。如项佐涛提出,中东欧政党政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粹主义阶段。^⑥徐刚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专题性论文。^⑦然而,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成为一个热门议题是近年之事。^⑧总体来看,

^① Attila Agh, “The EU Polycrisis and Hard Popul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From the Copenhagen Dilemma to the Juncker Paradox,”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Vol.13, Issue 2-3, 2017, pp.7-32; Don Kalb, “Upscaling Illiberalism: Class, Contradi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Populist Right in Post-socialist Central Europe,”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o.11, 2018, pp.303-321.

^② Danica Fink-Hafner, “A Typology of Populisms and Changing Forms of Society: The Case of Sloven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68, No.8, 2016, pp.1315-1339; Andrea L.p.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s of the Patr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9, No.4, 2014, p.615; Grigorij Mesežnikov et al.,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Bratislava, 2008, p.10.

^③ Emilia Palonen, “Political Polarisation and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62, No.2, 2009, pp.318-334; Joanna Fomina and Jacek Kucharczyk, “The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Populism and Protest in Polan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4, 2016, pp.58-68; Attila Ágh, “Decline of Democracy and Increasing Popul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Populist Democracy as Electoral Autocracy in Hungary,” ECPR Joint Sessions, Pisa, 24-28 April 2016, p.7; Petr Kaniok and Vlastimil Havlík, “Populism and Eurosceptic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Meeting Friends or Passing By?”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16, No.2, 2016, p.21; Jamie Bartlett et al., *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 Demos, 2011, p.33.

^④ Tua Lindquist, “Discurs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Populism: A Case Study on Fidesz and PiS,” Master Thesis, Uppsala University, 2019.

^⑤ Beata Ociepka, “Popu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Vol.XXXV, 2006, pp.97-107.

^⑥ 相关内容参见项佐涛:《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31-41页。

^⑦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2-69页。

^⑧ 参见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载《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6期,第18-28页;孔田平:《转轨、一体化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增长前景》,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3期,第119-127页;姬文刚:《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反思:基于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8期,第103-113页;项佐涛:《试析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81-106页;高歌:《匈牙利和波兰“欧洲化”道路的偏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第84-93页;姜琍:《捷克欧洲怀疑主义探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2期,第154-166页。

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外研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除了对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进行类型学分析和介绍其一般特征和主张外,关于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从中东欧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民族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并未从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的角度开展分析。在具体国别分析上,研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民粹主义政党的专题性文章就更少,只有两篇:李家懿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匈牙利的“欧尔班现象”,^①来庆立介绍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民族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②后者可以被视为从认同政治角度尤其是民族认同的角度来解释法律与公正党兴起的尝试。

基于长期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跟踪研究以及三国的选举数据,本文认为,单一的认同政治的视角无法准确解释波匈捷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尤其是比其他地区更具影响力(波兰、匈牙利、捷克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上台执政)的原因。与西欧相比,中东欧国家的民族和宗教更为单一,所受外来民族和文化的冲击更小。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例:波兰总人口中97%为波兰族,信奉天主教,讲波兰语,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截至2014年在波兰登记的迁入人口总计24.3万;^③匈牙利的马扎尔族占总人口的90%;^④捷克总人口的90%以上为捷克族,斯洛伐克族占2.9%,德意志族占1%,还有少量波兰族和罗姆族。^⑤相较而言,德法等西欧国家的人口构成更为多元化,德国居民中外籍人口占总人口的12%。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统计,德国吸纳国际移民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三,有超过160万人是移民的后代。^⑥作为全球第六大移民国家的法国,总人口中10%为外来移民。^⑦因此,客观上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内部“认同”问题并不如西欧国家那样紧迫。与之相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利益政治在波匈捷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过程中依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波匈捷民粹主义政党如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政党一样注意“打民族、文化、宗教等认同牌”,而不再以阶级动员为主要手段,甚至竭力回避“阶级”“阶层”等词语,但是“人

① 李家懿:《非“神”非“魔”的民粹主义——“欧尔班现象”的社会转型视角分析》,载《党政研究》,2019年第4期,第64-72页。

② 来庆立:《试析民族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意识形态建构——以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例》,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8-115页。

③ 王晓菊:《苏东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及移民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匈牙利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58/1206x0_679860/, 2020年7月20日访问。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EACEA Eurydice, “Population: Demographic Situation, Languages and Religions,” https://eacea.ec.europa.eu/national-policies/eurydice/content/population-demographic-situation-languages-and-religions-21_en,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20.

⑥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 Highlights,”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7_Highlights.pdf,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20.

⑦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Tableaux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Édition 2018,” <https://www.insee.fr/fr/statistiques/3303358?sommaire=3353488#consulter>,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20.

民”与“精英”的区分使其成功吸引了社会转型中的受害者——中下层收入者。正是通过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的双建构,民粹主义政党强化了底层民众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把草根的政治参与转换为自己的认同基础。

一 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观察民粹主义政党的两个视角

认同政治也称身份政治,一般指社会群体基于共同身份而展开的政治活动。认同政治自古有之,它“从来不是一个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身份的;所有的身份,都是政治的”。^① 在近代社会以前,人与人之间区分的重要标识就是“身份”,如宗教的身份、民族的身份、种族的身份、性别的身份、等级的身份……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将“个人”解放出来之前,个人生活在他(她)所在的集体身份之中,“身份”限定着他(她)的思想和行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身份政治让位于利益政治,或者说人的经济身份——阶级成为最重要的身份。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就深刻地指出经济关系对身份政治的冲击:“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②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未像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那样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在欧洲,中间阶级迅速兴起并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德国为例,1976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和职员等中产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达到50.7%,超过了工人的比重。^③ 中产阶级的政治趋向与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诸多方面表明自己决不是“传统主义者”,^④不再关心经济领域的平等和剥削问题,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阶级认同,通常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投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包含了一些价值观和行为,以及地位与权力资源的根本变革。许多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都强调指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套有关家庭与性行为、平等与参与、环境保护主义的后物质主义或后资产阶级价值观与在工业社会中占

^① Richard Thompson Ford, “Political Identity as Identity Politics,” *Harvard Unbound*, Vol.1, Issue 1, 2005, p.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③ [联邦德国]弗里德里希·费尔斯滕贝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结构》,黄传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大相径庭。”^①身份政治由此在20世纪中后期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然而,现在的认同政治与传统的认同政治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身份主要是集体身份,而现代身份既可以表现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在群体层面表达。在政治实践中,认同政治虽然更多的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如种族、族群、性别、特定性取向的人群,甚至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族,^②但是“当代身份政治代表着由等级政治、普遍政治向个体政治的演进,代表着由等级身份、经济身份向文化身份的变迁”。^③另一方面,认同政治所指的认同范畴不断扩大,远远超越了此前经济身份、宗教身份、民族身份,性别、环保和年龄等都被纳入认同的议题。同时,个体在社会中具有多元身份,这些身份是交叉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从而决定了认同的多元性和认同政治的复杂性。^④因此,“我们是谁的疑问”并不奇怪。“大多数身份集团并非建立在客观的生理相似或相异基础上,虽然他们都愿意声称自己是‘自然’形成的,而非社会建构的……身份就像服装一样可以互换或组合在一起穿戴,而不是唯一的,或像过去那样紧紧粘在身上”。^⑤

认同政治的“热度”源自近些年移民规模在欧洲的增长以及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宗教方面的差异。^⑥然而,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学术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认同政治虽然在当时已经对传统的利益政治造成强烈冲击,但是在学术界还未达到如今的热度。随着认同政治议题的不断演进、激化,目前已经成为诸多政治运动尤其是民粹主义运动的重要推手。正如考夫曼(L.A. Kauffman)指出的,身份作为一种新政治原则已进入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中心,其重要影响在于:一是身份成为组织政治的动员力量;二是解释身份成为政治的中心任务。^⑦在认同政治的视域里,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和对立是难以消除的,至少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手段难以奏效——人的性别、民族、宗教身份是

①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② Daniel Oesch, “Explaining Workers’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vidence from Austria, Belgium, France, Norway, and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9, No.3, 2008, pp.349-373.

③ 庞金友、洪丹丹:《大变局时代的身份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危机》,载《行政论坛》,2009年第6期,第5-13页。

④ Cressida Heyes, “Identity Politic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identity-politics/>, last accessed on 14 July 2020.

⑤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37-43页。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⑦ L.A. Kauffman, “The Anti-Politics of Identity,” *Socialist Review*, Vol.20, No.1, 1990, pp.67-80.

与生俱来的、更难改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可以说,工业社会塑造了一个比较明晰的阶级分层;后工业则将原子化的人从阶级、阶层的集体身份中重新解放出来,分属于民族、宗教、性别等身份,公民的投票行为由此开始突破阶级属性。阶级属性的政党影响力随之下降,因为社会原有分层为不同的身份认同所打乱。而且,认同政治强调的价值范式和身份认同的确对选民投票行为产生了影响。^①这使得固守利益政治和政治正确的传统政党手足无措,从而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兴起的空间。

国外学者对认同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的讨论跨度很大,涵盖了从宏观的人类学视域到中观的区域视角,以及微观的国别研究范畴。有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建构层面将民粹主义视为认同政治的一种“病理性表现”。^②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从全球经济状况、人们渴望强人领袖克服民主体制缺少决策力的政治心态、与身份认同相关的文化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指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深陷政治极化、文化分裂等危机的根源在于身份认同。国家、民族、宗教、派别、种族或性别等更为狭隘的认同形式日益占据上风导致了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治化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校园内的“身份自由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兴盛。^③还有学者以区域和国别事件为出发点,认为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是“国家民粹主义”的表现,是族群对自由主义范式中权力、财富、身份认知做出的反应。^④

国内也不乏从认同政治出发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但同样集中于研究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李强根据西欧和美国民粹主义的分析,认为近些年来全球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已经由利益政治转向认同政治,并指出“认同政治的心情构成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与精神渊源”;^⑤俞可平、林红分别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由外部压力导致的民族危机或认同危机感对欧美民粹主义的促发作用;^⑥孔元、林俊峰等人则聚焦于白

^① Daniel Oesch, “Explaining Workers’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vidence from Austria, Belgium, France, Norway, and Switzerland,” pp.349-373.

^② Marta Marchlewska et al., “Populism as Identity Politics: Perceived In-Group Disadvantage,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Support for Populis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9, Issue 2, 2018, pp.151-162; Onni Hirvonen and Joonas Pennanen, “Populism as a Pathological Form of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22, Issue 1, 2019, pp.27-41; Rogers Brubaker, “Why Populism?” *Theory & Society*, Vol.46, No.1, 2017, pp.357-385.

^③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of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美]弗朗西斯·福山:《新身份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7期,第51-57页。

^④ Hugh Gusterson, “From Brexit to Trump: Anthropology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Populism,”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44, No.2, 2017, pp.209-214.

^⑤ 李强:《认同政治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载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5页。

^⑥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9-14页;林红:《民粹主义全球性再现的根源:民众与政党的双重维度》,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95-103页。

人身份政治的突起与右翼保守主义浪潮的关系,认为身份政治为美国民粹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①

诚然,认同政治是雄心勃勃的,它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主张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理论建构来捕捉抽象的群体心理,但是相关研究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方法论上具备逻辑推演的合理与完整性,但是无法回避民众的认同感多与其不利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共生的现实,无法将其中一方面单独择出,证明对民粹主义的支持是由认同造成的或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

而利益政治主导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分析框架,它源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大多数群体对经济的普遍关切。之前基于血统、宗教、民族的群体虽然依旧存在并在某些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但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与经济集团尤其是阶级相比,处于次生或者从属地位。正如李普塞特(S. M. Lipset)所指出的:“每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现出来的,这基本代表着一种‘阶级斗争的民主转化’。即便许多政党否认阶级冲突和效忠原则,但分析一下他们的诉求与他们的支持,就会看到他们确实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所能做出的最基本的概括就是,政党不是主要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就是以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②与认同政治不同,在利益政治的视域里,人的身份、人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可以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在人的诸多角色中,经济身份是更为根本性的。

利益政治最为重要的拥趸者是社会主义者,其中以马克思主义者为甚。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宗教、民族都源自私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在共产主义社会都终将消失。^③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利益政治主要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④各阶级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经济关系,因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分属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等。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⑤阶级分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世界的主要方法,更是改造世界的主要方法。马克思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

① 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载《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第62页;林俊峰:《西方民粹主义与身份认同政治》,载《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第149-153页。

②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郭为桂、林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③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载《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5页。

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在政治实践上,阶级利益主要通过政党实现,各政党因其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分属在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它们登上政治舞台为其代表的阶级进行角逐。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却未能准确预见以下三个影响 20 世纪政治走向的重要议题:第一,在欧洲,阶级斗争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而且无产阶级斗争的热情在削减,暴力革命不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首选,议会斗争不再被无产阶级视为暴力革命的补充,而是争取自身权益、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新中间阶级的兴起;第三,无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在选举中并不全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者。“阶级地位(按教育、收入、地位、权力、职业和财产状况来衡量)与政治观点和正常选择之间的关系远非固定不变。许多穷人投票支持保守的,而某些富人却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②伦斯基进一步指出:“在 1955 年,西德的工人阶级分为几乎具有同等规模的三个群体:(1)支持社会党的人;(2)支持中立和右派政党的人;(3)没有任何党派偏向的人。在法国 1951 年的选举中,工人阶级中有 30% 的人将票投给了中立或者右派政党,另有 20% 的人没有投票。”^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尤其是暴力革命的学说部分,从 20 世纪初开始在西方世界受到质疑。

然而,截至 20 世纪末,利益政治依然是主流政治话语。霍布斯鲍姆在 21 世纪初还将 20 世纪称为“工人运动的世纪”。^④实际上,即便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认同政治被人们重新关注之后,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依然把经济议题作为最主要的议题,各政党依旧承认自己在政治光谱中的左右定位;去暴力革命、去阶级斗争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还是被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使用,并在政党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利益政治相关的测量,如选民的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仍然是选举分析的主要选项。如果选举数据说明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具有相似经济地位的中下层民众,那么利益政治是否还在起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6 页。

^②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第 194 页。

^③ [美]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31-532 页。

^④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 年第 6 期,第 33-37 页、第 68 页。

二 “明修栈道”的认同政治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政党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阵地,不像传统政党一样以某种意识形态为使命。一般来看,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政策是“取悦于民”,并且通常遵循一个独特的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范式:首先,识别社会发展中的不足和问题,将危机和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如归咎于转型期的传统执政党;其次,建构“人民”和“精英”/“危机造成者”的两分对立,通过舆论来渲染此种危机和对立;最后,提出强人领导和简单化的方案来解决危机,保持舆论气氛,俘获人心。^①通过上述范式,民粹主义政党成功地塑造着“我们”和“他者”的对立,并且将这种对立广泛地应用于抨击传统政党、强化民族主义、鼓吹文化排外等议题中以巩固和拓展自己的拥趸者。

民粹主义政党的第一张“认同牌”是塑造“人民”和“精英”的对立。它们通过重新建构“精英”和“人民”的概念,将传统精英塑造成与民众对立的“他者”,而自我标榜为“人民”的忠实代言人。^②它们认为,转型成果分配是不公正的,而民众在转轨过程中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精英形成了一个掠夺本国财富的联盟,需要在精英和人民之间重新分配财产。^③

民粹主义政党在捷克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它们致力于抹黑传统政党和精英,把社会诸多问题归咎于传统政党和精英的腐败与无能。^④“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通过批评传统政党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其自我标榜的“我们和那些政客不同,因为我们真正在工作”^⑤的口号成功吸引了选民的认同,而其创始人、商业巨头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更是自诩为“一名和你们一样对现状不满的公民”。^⑥

民粹主义政党的说法无疑是夸大其词的。诚然,在转型过程中,中东欧的传统政

^① Benjamin Moffitt, “How to Perform Crisi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Key Role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0, No.2, 2014, pp.189-217.

^② Cas Mudde, “Populism: An Ideational Approach,” in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9-30.

^③ Grigorij Mesežnikov et al.,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Bratislava, 2008, p.10.

^④ 姜珺:《捷克议会众议院选举几大看点》,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2期,第46-48页。

^⑤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a functional state with the rule of law” and “We’re not like the politicians—we work”, *Výzva ANO 2011*, <http://www.anobudlip.cz/file/edee/ke-stazeni/ostatni/ano-vyzva-ano.pdf>, last accessed on 28 June 2020.

^⑥ Vlastimil Havlík,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S.Pappas,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 Crisis: The Rise of Party Popul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Pappas, ed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ECPR Press, 2015, pp.199-216.

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参与了私有化进程并且暴露出或多或少的腐败问题,但是将传统政党和政客全部污名为腐败分子、只是为自身利益执政并不符合现实。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政府清廉指数排名都比较靠前,在 198 个国家和地区中,波兰为第 41 位、捷克排名第 44 位、匈牙利第 70 位。^①然而,对于民粹主义政党而言,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转型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找到了“替罪羊”。同时,他们将自身塑造为人民真正代言人的做法也迎合了民众“求新求变”的愿望。传统政党囿于意识形态“左”或“右”的定位,其政策主张不可避免地出现僵化、因循守旧的特点,而“因循守旧”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宣传中以及在部分民众看来意味着强化转型以来的社会弊病,依然是服务于特定的利益偏好和利益集团。民粹主义政党“取悦于民”的选举策略恰恰规避了传统政党无法及时转向的“暗礁”。^②可以说,民粹主义政党获得认同的根基之一是利用了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不再认同”。

民粹主义政党的第二张“认同牌”是民族牌。在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构建中,“人民”和“国家”在很多场景中被同一化。为了增加选民支持,它们往往试图将“人民”定义为单一的、同质化的群体,如匈牙利人和马扎尔人等,来营造“我们”和“他者”的话语逻辑。^③民族国家在现代政治社会原本有清晰的界定,个人是否是某国的国民本来是毫无争议的概念。然而,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把“人民”和“国家”同一化,人为地在身份认同上制造了更多重且界限模糊的判定标准。

例如,匈牙利青民盟领袖欧尔班(Orbán Viktor)善于利用国庆演讲等机会,带领民众重温 1848 年和 1956 年等重大历史时刻加深人民的共同记忆,强化民众的身份认同。^④他念念不忘警告民众,如果缺少强烈的身份认同,匈牙利就不能发展成为成功的现代化国家。^⑤捷克的“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视保护国家身份为其首要任务,认为移民是对国家身份的首要威胁;移民带来的恐怖主义袭击会威胁公共安全,其带来的外来文化会威胁民族身份。对此,“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还提供了“简单而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关闭欧洲边界,彻底防止非法移民,打击走私者,最重要的是将整个

^① 参见国际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 2019 年度《全球清廉指数》,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19/results/table>, 2020 年 6 月 20 日访问。

^② “Podporuje levici, proto volím pravici?” <http://andrejbabis.blog.idnes.cz/c/369510/Podporuje-levici-protovolim-pravici.html>, last accessed on 28 June 2020.

^③ Francisco Panizza, “Populism and Identifica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pp.409-410.

^④ “Orbán Viktor ünnepi beszéde az 1848/49. évi forradalom és szabadságharc 171. Évfordulóján,” <http://www.miniszterelnok.hu/orban-viktor-unnepi-beszede-az-1848-49-évi-forradalom-es-szabadsagharc-171-evfordulojan/>,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20.

^⑤ “Elismerjük a kereszténység nemzetmegtartó erejét,” <https://magyarnemzet.hu/belfold/orban-viktor-elismerjuk-a-keresztenyseg-nemzetmegtarto-erejeta-7530566/>,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20.

局势控制在欧洲大陆之外。”^①

与欧盟的关系是民粹主义政党塑造认同的另一件“常用武器”，也是“我们”和“他者”话语建构的另一个典型示例。在强调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时，欧盟往往成为被抨击的对象。例如，在青民盟的语境中，作为“我们”的匈牙利，传承了古老欧洲的基督教精神；而来自西欧和来自移民的文化正在“侵蚀”匈牙利的传统文化，而威胁的“始作俑者”就是欧盟的相关政策。^② 不仅欧盟被“他者化”，本国亲欧盟派的传统精英也被“他者化”。亲欧盟的传统精英不仅是“碌碌无为的政客”，甚至成为“不够爱国的政客”或者“不如我们那么爱国的政客”。^③

民粹主义的第三张“认同牌”是文化、宗教牌。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强调本国宗教的至上性和国家在维护本国宗教和文化纯洁性方面的职责，试图将宗教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而且将移民、伊斯兰问题与国家安全、民族和文化纯粹性关联，大肆渲染“伊斯兰教=(潜在的)恐怖主义”的言论，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是操纵欧洲伊斯兰合法化的工具。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以罗马天主教和国家道德的捍卫者自居并引以为豪”。^④ 青民盟自然也“不甘落后”，而且将诸多主张付诸实践。它多次强调，基督教是匈牙利人身份认同的根基，是匈牙利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的基础。^⑤ 2012年，青民盟利用议会多数席位通过的新宪法开始实施。宪法序言第一段就明确提出“上帝保佑匈牙利”，将匈牙利的身份认同置于“基督教欧洲”中，将宗教信仰视为民族团结最基本的手段。在宗教贯穿于政治的同时，政治干预宗教的事例在匈牙利也频频出现。国家不再支持自由创办教会，甚至建立了所谓“宗教计划组织”对教会进行直接的管控。仅在2012年，就有超过300个教会团体被政府取缔。从2015年开始，青民盟更是利用不断发酵的难民危机，增加民众尤其是农村和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小型城市的中下层群体对基督教的认同感。

总而言之，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建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政党的措辞，

^① “Ted’ nebo nikdy. Ten jediný program, který potřebujete,” <https://www.anobudelip.cz/cs/makame/aktuality/novinky/ted-nebo-nikdy-35720.s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20.

^② “Prime Minister Viktor Orbán’s Speech upo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http://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the-prime-minister-s-speeches/prime-minister-viktor-orban-s-speech-upon-the-formation-of-the-new-government>, last accessed on 10 June 2020.

^③ Benjamin de Cleen,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pp.347-348.

^④ Jakub Dymek, “Poland’s Rightward Turn,” *Dissent*, Vol.63, No.2, 2016, p.121.

^⑤ “Orbán Viktor: Európát csak az mentheti meg, ha visszatérül keresztény identitásához,” <https://hirado.hu/belfold/kozelet/cikk/2019/11/26/orban-viktor-nekunk-keresztényeknek-jogunkban-all-megvedeni-kulturankat-eletformankat>,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20; “Orbán Viktor: Erős nemzeti identitás nélkül nem lehetünk sikeresek,” <https://magyar nemzet.hu/kulfold/orban-viktor-eros-nemzeti-identitas-nelkul-nem-lehetunk-sikeresek-7750631/>, last accessed on 28 June 2020.

提升了本国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和发展道路认同,从精神层面巩固了民粹主义政党与民众同属于“我们”的阵营,并且将与自身理念不同的主体和范式设定为对立的“他者”。^①然而,单凭民族或者文化方面的“认同”,并不足以支撑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实践,能让它们在政坛“站稳脚跟”乃至高票当选或保持连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迎合民众对经济利益的关切。

三 “暗度陈仓”的利益政治

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的执政浪潮出现于2010年之后。在此之前,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均以转型的“优等生”著称。然而,“中东欧国家开放的过程就是跨国公司所有权的获得与本土所有权丧失的动态失衡过程。跨国公司不仅获得所有权,而且从中东欧国家手中拿走了从固定资产中收取租金的权利,消灭了中东欧国家的民族品牌”。^②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国家经济受创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增加,中下层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据统计,2008-2010年,中东欧国家有38%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其中家庭工资下降29.3%,19.8%的家庭有成员失业,13.1%的家庭工资被拖欠或停发。2011年进行的第二次“转型中的生活调查”显示,民众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并没有明显改善,在匈牙利等国还出现了下降态势。^③

有鉴于此,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制定了更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和政策纲领,主要包括:第一,提高外资占比较高企业的税收,保护民族企业。例如,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2016年决定对外资持股较多的银行业和零售业提高税收。^④第二,在能源、资源、银行等外资占比较重的行业推行国有化。例如,青民盟政府收购了通用资本布达佩斯银行和巴伐利亚银行控制的匈牙利外贸银行;以18.8亿欧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收购了匈牙利油气集团21%的股权,匈牙利油气集团收购了意大

^① Seongcheol Kim, “Between Illiberalism and Hyper-neoliberalism: Competing Populist Discours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February 202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23745118.2020.1709368?needAccess=true>,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20.

^② 薛莉:《一体化进程中经济的失衡与失序:对中东欧金融危机的反思》,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第36-39页。

^③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LITS) 2006: A Brief Report on Observations, Experiences and Methodology from the Survey,” <http://www.ebrd.com/cs/Satellite?c=Content&cid=1395237699753&d=&pagename=EBRD%2FContent%2FDownloadDocument>, 12/06/2020;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II,” <http://www.ebrd.com/cs/Satellite?c=Content&cid=1395237690999&pagename=EBRD%2FContent%2FDownloadDocument>, last accessed on 14 June 2020.

^④ 在2016年波兰财政部公布的税收清单中,从企业税中专门新增一项“外资控制企业收入税”,<http://www.mf.gov.pl/en/ministry-of-finance/state-budget/revenue-expenditure-deficit-execution/2015>, 2020年6月15日访问。

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麾下的匈牙利分公司。第三,积极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政策。例如,青民盟政府通过“公共就业”项目等多种方式增加社会底层的民众重返工作岗位的机会;扩大家庭住房补助优惠的范围;推行“家庭保护行动计划”鼓励生育,终生免除生育4个孩子的母亲的个人所得税并计划扩大至生育3个孩子的母亲;致力于实现全面的托儿所护理。^①捷克的“不满意公民行动2011”许诺减免增值税和居民的住院开支,提振就业率,降低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务负担,给教师等职业提升薪资,坚持国有企业在能源等领域占有的份额。^②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组阁以来致力于打造“波兰版的福利社会”,在政府干预经济和“慷慨”的社会福利投入上颇有左翼政党的风格,2016年起对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发放每月500兹罗提津贴,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不受独生子女的限制也可享受津贴;对领取养老金、抚恤金的人群发放1100兹罗提的单次津贴;对26岁以下的年轻工人减免所得税;将最低工资标准从2250兹罗提增至4000兹罗提,等等。^③

民粹主义政党的策略是成功的。强调福利要留给本国国民的“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与认同政治的导向产生了高度重合性,即都是面向本国的“主流”和“多数”,为民粹主义政党争取了此前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选民——这部分社会群体对主流政党尤其是传统中左翼政党为了加入欧盟而在经济政策上的不断中立化备感失望。^④选举数据表明,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选民支持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以收入中下层民众为主的特点,大量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投诚”于民粹主义政党。波兰、匈牙利和捷克都呈现相似的趋势。

青民盟自2004年起成功地把原本支持社会党的选民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⑤青民盟与社会党的支持率在不同职业等级的群体中呈现明显的倒置特点,前者在体力劳动者、专业技能人员、个体经营者等群体中拥有显著的支持率优势,后者在中高层管理者群体中拥有较高的支持率。社会底层人员和学历较低者中一些原社会党支持者转

①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布7项家庭保护行动计划》,中新社匈牙利新导报,<http://www.newsduan.com/newsyun/HuaMeiJingXuan/OuZhou/xylxdb/20190212/109683.html>,2020年7月15日访问。

② Česká televize,“Babiš chce pojišťovnám vzít peníze na provoz, měly by jít na péči,” ČT24,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ekonomika/269385-babis-chce-pojistovnam-vzit-penize-na-provoz-mely-by-jit-na-peci/>.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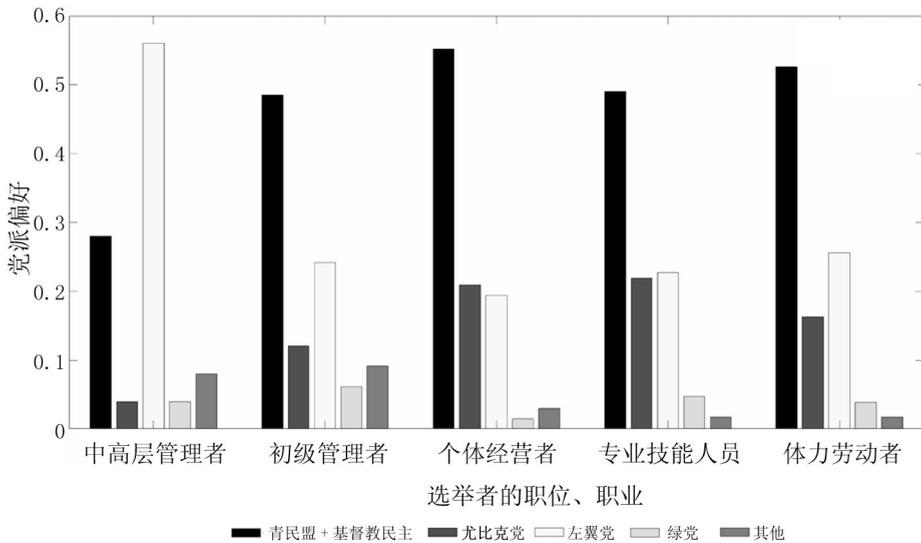
③ Annabelle Chapman,“Poland’s Law and Justice Party Has Triumphed again by Fusing Left and Right,” *Newstatesman*, 14 October 2019.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europe/2019/10/poland-s-law-and-justice-party-has-triumphed-again-fusing-left-and-right>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20.

④ Dorottya Szikra,“Democracy and Welfare in Hard Times: The Social Policy of the Orban Government in Hungary between 2010 and 2014,”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24, No.5, 2014.

⑤ “Szegénység és falvak: innen jön a Fidesz-kétharmad,” https://index.hu/belfold/2018/valasztas/2018/04/10/orszagszakadas_amig_a_fidesz_elkiszagzasodni_a_baloldal_kinyirta_magat_videken/, last accessed on 28 June 2020.

投了青民盟。具体来看,2002-2004年,匈牙利的体力劳动者和底层居民还倾向于支持社会党,但是此后青民盟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匈牙利体力劳动者和底层居民的选票。2009年,支持青民盟的底层居民人数已经远超过支持匈牙利社会党的底层人数;2010年,底层匈牙利人投给青民盟的票数创新高,参见图1。

图1 匈牙利不同职业群体的政党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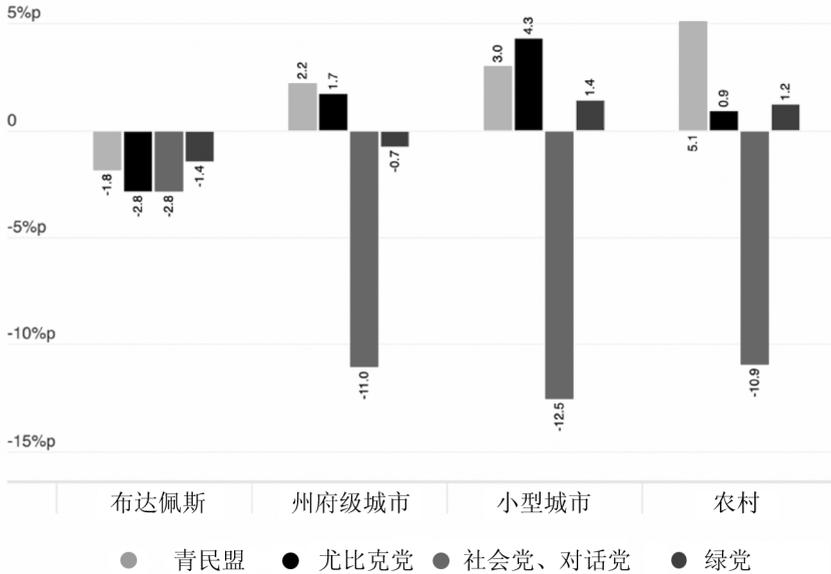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Valuch Tibor, “A Jelenkori Magyar Társadalom,” Budapest, Osiris 2015, <http://old.tarki.hu/adatbank-h/kutjel/pdf/b344.pdf>, 2020年6月12日访问。

从地域看,青民盟的支持者主要在农村和贫困地区。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青民盟在中小城市、农村、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支持率高于其在大城市和发达程度较高地区。其中,最不发达地区的支持率为65%;不发达地区为58%,中等发达地区为55%,发达地区为53%,最发达地区为44%。与之相反,社会党在布达佩斯、匈牙利多数大城市、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支持率高于中小城市、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最不发达地区的支持率为8%,不发达地区为8%,中等发达地区为9%,发达地区为10%,最发达地区为14%,如图2所示。^①

^① “Szegénység és falvak: innen jön a Fidesz-kétharmad”.

图2 2014-2018年匈牙利主要政党在不同地区的支持率变化



资料来源：“Szegénység és falvak; innen jön a Fidesz-kétharmad”。

相似情况同样出现在波兰。不同的是民粹主义政党“侵蚀”的是传统中右翼政党的票仓,原因是作为中左翼政党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因腐败丑闻突然衰落并边缘化,其中下层选民分散到了公民纲领党(PO)等其他党派。

波兰政党格局大致从2005年开始确定下来,其特点是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与中右翼的公民纲领党两党独大,二者支持率合计保持在60%以上。此外,较活跃的还有代表农民的波兰农民党(PSL)、中左翼的左翼联盟(SLD)、中右翼的帕利科特运动(RP)、现代党(.N),民粹主义库季兹运动(K'15)、联盟党(KWiN)、自卫党(SO)和波兰家庭联盟(LPR)。波兰最近三次议会选举(2011年、2015年和2019年)的总体趋势是社会在不断民粹主义化。法律与公正党的支持率由2011年的29.89%上升到2015年的37.58%,再到2019年的43.59%,公民纲领党的支持率则由2011年的39.18%下降到2015年的24.09%,2019年稍微回升到27.40%。右翼和民粹政党的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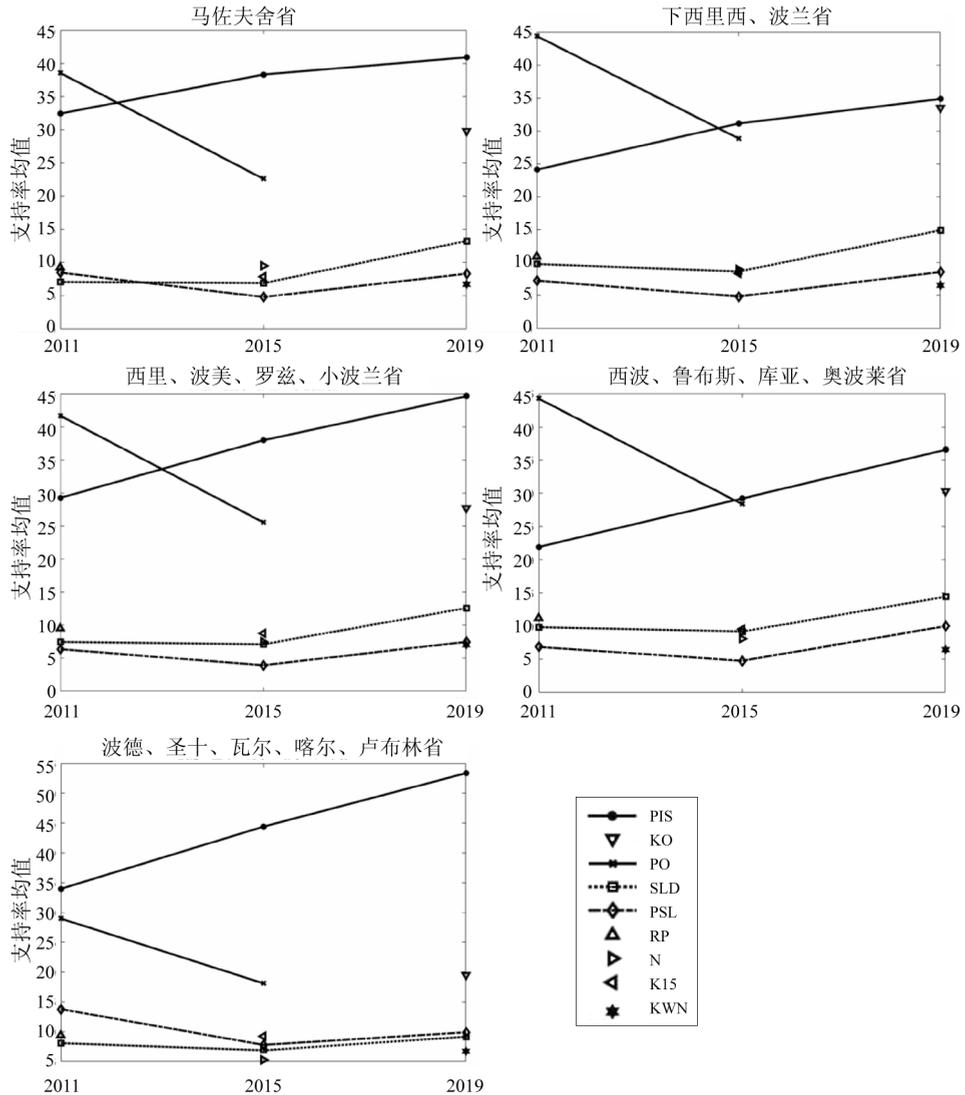
持率总和则从 2011 年的 30% 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45%，再到 2019 年的 50%。^①

究竟是哪些波兰选民支持了民粹主义政党呢？按照人均 GDP 的差异可将波兰的 16 个行政区分为五组，如果对同一政党在每一组中 2011 年、2015 年、2019 年的支持率取均值，可以观察到各地区对不同政党的支持率差异。第一组是首都华沙所在的马佐夫舍省，人均 GDP 为 33500 欧元，达到欧盟内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组是西部靠近德国的下西里西亚和大波兰两省，人均 GDP 约 23000 欧元，是传统的经济发达区；第三组是南方靠近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波美拉尼亚省、罗兹省和小波兰省（波美拉尼亚省除外），人均 GDP 约 21000 欧元；第四组是西部内陆的西波美拉尼亚省、鲁布斯省、库亚瓦波美拉尼亚省和奥波莱省，人均 GDP 约 17000 欧元；最后一组是内陆和东部、东南部靠近乌克兰的波德拉斯省、圣十字省、瓦尔米亚马祖尔省、喀尔巴阡省和卢布林省，人均 GDP 不到 15000 欧元，是传统的经济落后地区。总体上看，波兰中下层选民主要支持法律与公正党。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法律与公正党已经形成一家独大的趋势，无论是公民纲领党还是波兰农民党，抑或是其他民粹主义政党都难以与之抗衡。在西部和首都附近的经济发达省份，法律与公正党的优势虽不明显，但是中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在近 10 年一直下滑，民粹主义政党和重新复苏的左翼政党成为中下层民众的替代选择。

具体来看，经济落后地区一直是法律与公正党的票仓。法律与公正党的支持率从 2011 年 35% 左右飙升到 2019 年的 55%，其他民粹主义政党也没有表现出能够挑战法律与公正党地位的趋势；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变化不大，农民党的影响力不增反降，中右的自由派政党成为最大的输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2019 年选举数据显示，公民纲领党与现代党组成的公民联盟、农民党与库季兹运动组成的波兰联盟的支持率相比，2015 年各政党的支持率总和并没有增加，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下滑；法律与公正党的支持率也未显著提升；变化明显的是民主左翼联盟党，它的支持率由 2015 年的 8% 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15%，如图 3 所示。

^① 有关波兰议会选举数据，参见波兰政府网站，<https://wybory.gov.pl/sejmsenat2019/en/wyniki/senat/pl>，2020 年 6 月 20 日访问。

图3 波兰各地区政党支持率变化趋势图(2011-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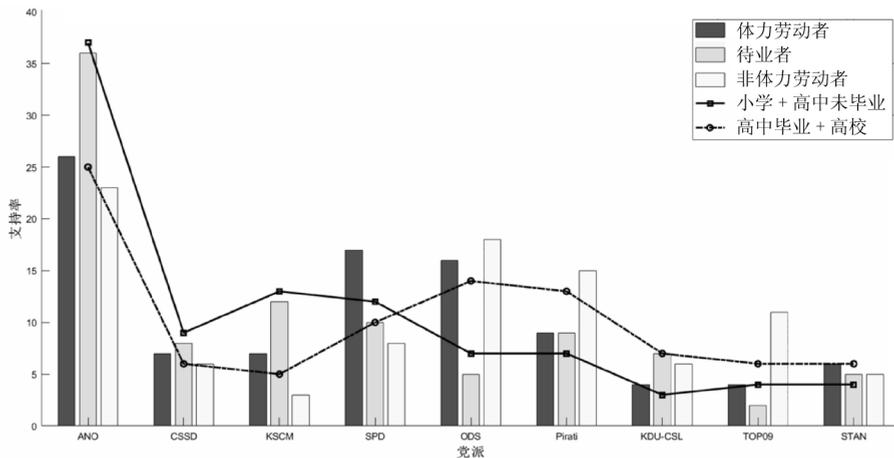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波兰议会选举数据计算,参见波兰政府网站, <https://wybory.gov.pl/sejmsen-at2019/en/wyniki/senat/pl>, 2020年7月10日访问。

捷克转型后的政党格局比较稳定,形成公民民主党(ODS)、社会民主党(ČSSD)、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SČM)以及基督教民主联盟(KDU-ČSL)四足鼎立的局面,而且每个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相对清晰。然而,自2010年选举以来,传统政党的

地位受到来自中右翼新兴政党“TOP 09”以及民粹主义政党“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海盗党(Pirati)^①的挑战,支持率不断走低,对选民吸引力逐渐下降。^②在 2017 年的议会选举中,“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获得 200 个议会席位中的 78 席,获得组阁权;海盗党赢得 22 席,公民民主党仅获得 25 席,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只有 15 席。捷克各政党支持率较为直观地反映了不同学历和职业的选民的群体偏好。图 4 显示,非体力劳动者和学历较高的人群倾向于支持海盗党、“TOP 09”和公民民主党;体力劳动者、待业者以及受教育程度相对低的人群倾向于支持政治立场更极端、更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自由和直接民主运动(SPD)。^③

图 4 捷克各个学历和职业群体的党派支持率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 9 月捷克政党支持率数据绘制,参见 <https://tn.nova.cz/clanek/do-sne-movny-by-postoupilo-8-stran-volby-by-vyhralo-ano.html>, 2020 年 6 月 16 日访问。

总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并不具备一个具有共同意识形态指向的“阶级”或者“阶层”作为支持群体,团结在它们周围的“人民”只是一些社会地位、职业和教育程度等类似的单个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政党没有明确的政治动

① 捷克海盗党作为组建不久的年轻的政党,宣扬反建制、反腐败,提倡通过信息自由和信息透明营造直接民主,其支持者有一部分来自公民民主党。

② See Vlastimil Havlík,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S. Pappas, eds.,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 Crisis: The Rise of Party Populism,”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2015, pp.199–216.

③ “Czech Pirates, ahoy!”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zech-pirate-party-anti-establishment-ivan-bartos-ahoy/>, last accessed on 16 June 2020.

员指向,也不意味着支持民粹主义的民众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基于相似的社会地位、职业和教育程度选择了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在社会转型已经完成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虽然对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表示不满,却不反对既有的社会体制。它们不像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那样追求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致力于所有制变革,而是巧妙地把经济问题转向民生领域,包装成是为了解决“我们”和“他者”的矛盾。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还是反对外国资本、本国大企业家,都是如此。一切都是以“人民”之名进行,而不是某个阶级或者阶层。

结 语

利益政治虽然主导了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政治活动,但是早在20世纪初,韦伯(Max Weber)就研究了阶级身份与其他身份共存的现象。在韦伯看来,由血统、宗教和职业划分而来的地位群体,可以存在于阶级内部,也可以跨阶级存在。^①如今,部分学者强调认同政治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经济议题不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那样是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选民开始关注经济以外的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人类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之前被地理或者主权国家分割的人群如今可能聚合在一个狭小的行政空间,甚至在虚拟的网络社区内进行互动,从而加剧了“认同”问题的产生。更需要指出的是,分裂不仅出现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而且发生在单个人身上。不同身份撕裂着公民个体,比如他(她)在选举中是按照阶级身份投票,还是按照民族身份投票,还是作为一个男性(女性)投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政治现实是,即便同文化、同宗教和同种族的个人形成的共同体,其成员也总是同步拥有着各自的阶级身份。正如沃利斯(V. Wallis)指出的: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由个人的种族、宗教或文化身份决定的利益清单;在任何一个由种族或文化所形成的集体中,个体的核心利益都会因为阶级地位或阶级忠诚而有所不同。阶级权力弱化只是一种幻想。^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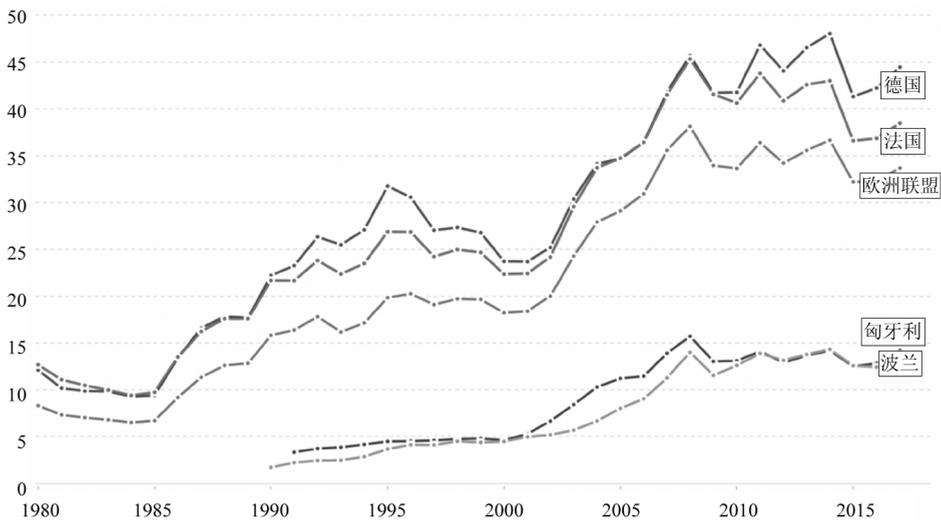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案例至少提供了一个切实的证据: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不仅仅是认同问题,因而不能忽略“认同”背后的经济因素。正如捷克和匈牙利案例所表明的,部分中下层由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转变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但是无法确定他们选举行为的转向只是因为宗教认同或者民族认同。实际上,正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4-262页。

^② [美] 维克多·沃利斯:《交互性的粘合剂:阶级的政治优先性》,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第59-69页。

是通过认同政治和利益政治的双建构,民粹主义政党强化了底层民众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把草根的政治参与转换为它的认同基础。甚至可以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民粹主义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双进程加重了民众对经济情况的不满与担忧。^① 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地区差距的对比和落差感。从人均 GDP 来看,匈牙利、波兰等国在入盟后与法国、德国以及欧盟人均 GDP 的波动方向一致,表明经济愈发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但并没有呈现出差距缩小的趋势(见图 5)。2006-2010 年世界银行在欧盟的民调显示,匈牙利是成员国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国家之一,72%的匈牙利人认为自己经济方面的处境还不如社会主义时期。^② 一旦经济发展的“收益”减弱,不能抵消再分配、安全保障等政治和社会代价,普通人对全球化及其“始作俑者”——政治和经

图 5 匈牙利、波兰人均 GDP 与欧盟均值对比图(1980-2017 年,千美元/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民经济统计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end=2017&locations=DE-EU-HU-FR-PL&name_desc=false&start=1980, 2020 年 7 月 16 日访问。

^① 参见项佐涛:《试析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第 81-106 页;项佐涛、李家懿:《中东欧转轨三问——30 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6 期,第 83-91 页。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Hungary Dissatisfied with Democracy but not Its Ideals,” <http://www.pewglobal.org/2010/04/07/hungary-dissatisfied-with-democracy-but-not-its-ideals/>, last accessed on 4 July 2020.

济精英的“反击”就以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①正如捷克学者哈夫利克(Vlastimil Havlík)等人的评论在中东欧国家具有普遍意义:民众的不满早已埋下。经济危机作为催化剂,导致了民众对传统政党及其“政治正确”的抨击日益白热化。^②

可以说,在民粹主义政党的语境下,利益政治的诉求或是与认同政治的话语同时出现,或是被巧妙地隐藏在“认同政治”之下,没有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宣称完全无视利益政治,而只是寻求民族或者宗教“认同”,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更是把利益政治作为长期执政的必备选项。民粹主义政党清楚地认识到,能够被其“认同”口号动员起来的并不是整个民族或所有的基督徒(东正教徒),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中下层收入者,大城市的中上层并不“不买账”。换言之,民粹主义政党语境下的认同是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的,它只是让利益政治的表达方式更加含蓄和隐晦,而不再是赤裸裸的单一议题。正如有学者分析“不满意公民行动2011”时指出的,民众支持它并不是因为其提出的某个具体使命或价值宗旨,而是出于对于改变生活现状的迫切渴望。这侧面印证了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并不全然来自认同感的构建,还出于现实的利益诉求。^③

综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互构的过程,“明修栈道”的是认同政治,“暗度陈仓”的却是利益政治。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社会转轨并没有倒转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纷繁复杂的认同关系、政治关系和法的关系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经济的、生产的关系,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④

(作者简介: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家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See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2011;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Vol. 1, 2018, pp.12-33.

^② See Vlastimil Havlík,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S. Pappas, eds.,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 Crisis: The Rise of Party Popul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pp.199-216.

^③ Sean Hanley, “Czech Elections: How a Billionaire Populist Upstaged Established Partie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vember 9, 2013, <https://www.e-ir.info/pdf/44163>, last accessed on 12 July 2020.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